

## 吐蕃与南诏交往略考

田 峰

(伊犁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摘 要:**吐蕃王国建立后,统治者采取了全面向外扩张的政策,其中与南诏的交往成了吐蕃西南方向经营的重点,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吐蕃与南诏之间主要形成了两条通道,一条是芒康—德庆—铁桥—羊苴咩城道;一条是从察隅过大雪山,沿高黎贡山西侧的梅开恩江至永昌。由于吐蕃军事扩张的需要,前一条道路的重要性显然要超过第二条道路,在多数时候,吐蕃不惜一切代价牢牢掌控着第一条道路,这使得吐蕃在其向东南的扩张显得得心应手。

**关键词:**吐蕃;南诏;交通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10)01—0132—03

吐蕃通南诏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芒康—德庆—铁桥—羊苴咩城道;一条是从察隅过大雪山,沿高黎贡山西侧的梅开恩江至永昌。由于吐蕃军事扩张的需要,前一条道路的重要性显然要超过第二条道路,在多数时候,吐蕃不惜一切代价牢牢掌控着第一条道路,这使得吐蕃在其向东南的扩张显得得心应手。

南诏是我国历史上“蛮部”的重要一支,它是在统一西洱海诸蛮的基础上,以乌蛮、白蛮等为主体建立的政权。西洱河湖地区早期的形势是极其不明朗的,据《唐会要》记载:“有数十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统摄。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sup>[1](P1750)</sup>由此可以看出,西洱河湖地区的种姓是非常复杂的,但他们大多数已经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文明程度已经很高。这些地方有“城郭村邑”等,可以推测大多部落已由游牧狩猎转向农耕文明,其中白蛮的发展程度最高,受此影响乌蛮等部落也相继迁入,先后在西洱河湖地区建立了“六诏”。

“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sup>[2](P5280)</sup>这一支乌蛮逐渐在西洱河湖地区兴盛了起来。唐朝很早就介入了西洱河湖地

区,采取的手段是以武力征伐为主,其中最有成效的一次当属唐将梁建方讨西洱河蛮。“建方自嵩州道率奇兵掩之,其帅杨盛大骇,欲遁而走,唐派使者好言使其归降。贞观二十二年(648),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敛,松外首领蒙羽皆入朝,授官秩。”<sup>[3](P6322)</sup>这个时候唐把主要精力放在讨伐白蛮上,属于乌蛮蒙氏的蒙舍诏在此时发展起来,实力逐渐显现,“开元初,罗盛死,子盛罗皮立,盛罗皮死,子皮罗阁立。二十六年,诏授忞进,封越国公,赐名归义。其后破河洱蛮,以功策授云南王,归义渐强盛,余五诏浸弱。先是,剑南节度使王昱受归义赂,奏六诏合为一诏。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益骄大。”<sup>[2](P5280)</sup>南诏依附唐朝的势力很快统一了六诏,建立南诏国,曾经混乱不清的西洱河湖地区形势逐渐明朗起来。于公元738年南诏统一其他部落。

吐蕃进入云南西北的具体时间,以及关于吐蕃入滇的时间学界颇有争议,藏文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赵心愚先生曾撰写《吐蕃入滇时间及路线考》<sup>[4]</sup>,对吐蕃入滇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一时间应当是7世纪50年代初或稍前。《资治通鉴》明确记载永隆元年(680),吐蕃与云南发生了一件事情,但在这之前吐蕃是否涉足云南,没有明确的记载。其云:“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

收稿日期:2009-09-10

作者简介:田峰(1980—),男,甘肃会宁人,文学硕士,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之路。吐蕃以生羌为乡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河诸蛮皆降于吐蕃。”<sup>[5](P6395)</sup>此时,吐蕃与唐在川西的争夺已经相当激烈,安戎城的攻克成了诸蛮皆降于吐蕃的直接因素——吐蕃切断了唐与诸蛮的联系,使得唐朝的军队不能南下蛮部,这样吐蕃就可以从另一条不直接经过唐域地盘的道路入蛮,这条路就是我们所说的芒康—德庆—铁桥线。

为了更加快捷地进入云南,吐蕃在滇西北建立了蕃蛮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神川铁桥(按:关于神川铁桥的建造者,冯智先生曾做过详细的考论<sup>[6]</sup>),同时在此设立了神川都督府。公元689年,在唐的胁迫下,臣服于吐蕃的西洱河诸蛮纷纷反蕃归唐,《资治通鉴》记载:“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来降;以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令统其众”<sup>[7](P6457)</sup>。其时,刚刚执政的赤都松赞以强硬的态度开始了争夺南诏的战争,赤都松赞(676—704)在西北与唐、突厥进行交战的同时,东南方向的诸蛮也成了他经略的重点。赤都松赞正式执政是在公元685年,他执政19年时间,在这19年里他不仅铲除了权倾朝野的噶尔家族,更重要的是对东南诸蛮的经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身先士卒,死于征服南诏的战争中。吐蕃敦煌藏文历史文书详细记载了此赞普对南诏的经营,据《编年史》:

兔年(公元703年)……冬,赞普赴羌地(六诏),并攻陷之。一年。<sup>[8](P46)</sup>

龙年(公元704年)……冬,赞普赴蛮地主政期间升天。<sup>[8](P46)</sup>(按:关于赞普之死,汉、藏史籍有不同的说法,《旧唐书·吐蕃传》:“时吐蕃南境属国尼婆罗门皆叛,赞普自往讨之,卒于军中。”<sup>[9](P5226)</sup>此与《新编尼泊尔史》相一致。)《赞普传记》:

后来夺六诏之疆土,征白蛮之税,收乌蛮之属民。以权势之显赫,疆域之辽阔而言,胜过这位赞普者,以往历代所不曾有也。<sup>[8](P254)</sup>

可见,赤都松赞经略东南诸蛮,的确比吐蕃其他赞普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他对滇藏交通有很大的贡献。唐朝此时也不愿意退出蛮地,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唐与吐蕃围绕蛮地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唐朝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拉拢南诏对其他五诏进行兼并战争,以起到扼制吐蕃的作用。西洱河北面的遼贛、浪穹、施浪等乌蛮面对南诏的强大攻势,只能退居于神川都督府境内以寻求吐蕃的保护,此时吐蕃以神川铁桥为据点。

唐蕃争夺南诏的转折点是在公元750年左右,《旧唐书》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

七年,归义卒,诏立子阁罗凤袭云南王。无何,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为云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谋,虔陀矫诈,待之不以礼。旧事,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阁罗凤忿怨,因发兵反,攻围虔陀,杀之,时天宝九年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戎、嵩州。阁罗凤遣使谢罪,仍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虏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兵逼大和城,为南诏所败。自是阁罗凤北臣吐蕃。吐蕃令阁罗凤为赞普钟,号曰东帝,给以金印。<sup>[2](P5280-5281)</sup>(《册府元龟》、《新唐书》、《资治通鉴》亦有类似记载)

《旧唐书》的这一记载,在敦煌发现的《赞普传记》里得到了印证,其载:“南方下部的南诏腹地,有一个叫乌蛮的不小的酋长部落,赞普以其高深之谋略下诏,蛮王阁罗凤者,前来称臣敬礼,赞普赐以‘钟’之名号。因此,人多之国又添属民地博之士又增加疆域。”<sup>[8](P285)</sup>这就是南诏北臣吐蕃的全部过程,南诏与唐王朝进行全面对抗,并且将自己的势力迅速延伸到了四川西南的嵩州等地。当然,南诏北臣吐蕃获益最大的是南诏。

吐蕃使南诏称臣后,并没有建立起长期的统治,由于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兵役等,南诏总是思归唐朝,《资治通鉴》:“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sup>[10](P7479)</sup>(《旧唐书》、《新唐书》亦有类似记载)。借此机会,剑南节度使韦皋从中挑拨离间,异牟寻也发誓:“收复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sup>[11](P331)</sup>。贞元十年(794):“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罗楨献地图、土贡及吐蕃金印,请复号南诏。”<sup>[12](P7561)</sup>十年正月(794):“南诏蛮异牟寻打破吐蕃于神川,使来献捷。”<sup>[13](P11687)</sup>神川铁桥陷落后,吐蕃退居纳川(今中甸附近)<sup>[14]</sup>等地作垂死挣扎。吐蕃尽管发动了很多次进攻,但都未能夺回神川铁桥,神川铁桥的陷落是吐蕃在云南逐渐退出的标志。因而,神川铁桥对吐蕃入主云南具有重大意义。

吐蕃在神川铁桥,设立了神川都督府,这保证了吐蕃与云南之间的顺利沟通,吐蕃在这里可以统揽全局,运筹帷幄。那么,神川铁桥到底在什么位置呢?《云南志》卷十一:“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贞元十年南诏蒙异牟寻用军破东西两城,斩断铁桥,大笼官以下投水死者以万计。”<sup>[11](P232)</sup>铁桥城的具体位置在今天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

西县塔城乡。樊绰所言的“铁桥城”大致在金沙江两岸,为守护铁桥而设。按冯智先生的意见,铁桥西城在塔城关,东城在今其宗村<sup>[6]</sup>。东城可通纳川,西城向南是剑川,向西可通剑寻城(今维西),西北方向通向小施戛、大施戛、弄视川、聿赉城(今德庆)等地,然后进入今之西藏边境。铁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吐蕃统治该地后建立神川都督府,并且设铁桥节度,统十六城。

该道除了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外,在经济上也很重要。在吐蕃被赶出铁桥之前,异牟寻曾贡大量土特产,如铎鞘、浪川剑、生津、瑟瑟、牛黄、琥珀、白叠茂、纺丝、象牙、犀角、越戛马、统备甲马、并甲文金等“方土所贵之物也”<sup>”[11](P342)</sup>。该地不仅有如此众多的物产,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盐井,据《云南志》载盐出处甚多,主要是“剑寻东南有傍弥潜井、沙追井”,“剑川有细诺邓井”,铁桥东的昆明城(盐源)<sup>”[11](P263)</sup>,这些地方都大量出产盐。吐蕃控制了铁桥后把大量的盐源源不断地送入吐蕃。当然这条路也就成为商业往来的一条通道,《云南志》:“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sup>”[11](P284)</sup>,商品的种类不仅仅是羊,包括了其他众多的商品。足见,吐蕃占领神川铁桥后这条路很快繁荣起来。

铁桥建立之始,滇藏关系也就拉开了序幕。铁桥所负载的军事与经济使命,使整个中国西南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有唐一代铁桥成了唐、吐蕃、南诏三方面关系的一个表征。在今天,历史所遗留下的余响还在延续着,神川铁桥更多的时候成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象征。这里有许多民族杂居,不同文化的碰撞,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而此与吐蕃的介入毫无疑问是有密切联系的。

此外,樊绰《云南志》中还记载了一条从软化府(今腾冲)到宝山城,过丽水到金保城,再至大戛(今之葡萄),翻越大雪山到吐蕃的道路,“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戛,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地有瘴毒河戛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戛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遂罢弃,不复往来。……三面皆大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戛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sup>”[11](P68)</sup>这是处在高黎贡山之西的一条道路,从樊绰的记载我们知道这里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相当恶劣,是无法与前面

所述的铁桥相比的,但也可以看出,这条路主要是一条民间贸易之路,吐蕃人经常经过大雪山在这里与蛮各部落进行商品交易。

在南诏与吐蕃之间可能也存在其他道路,不过主要通道仍然是官方那条过神川铁桥到聿赉再到芒康德那条道路。这条道路是吐蕃中后期中国西南政治、军事形势的一个缩影,也是一条友谊之路,一条民族融合之路。在今天这条路肩负着历史的遗迹,依然是民族交往的一条主要通道。我们通过此路可以看出吐蕃势力在云南一带的沉浮,这对于研究吐蕃、南诏、唐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有重要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北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南蛮西南蛮传[A].旧唐书(卷197)[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南蛮传[A].新唐书(卷222)[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赵心愚.吐蕃入滇时间及路线考[J].西藏研究,2006(2).
- [5]唐纪18[A].资治通鉴(卷202)[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6]冯智.吐蕃南诏神川铁桥考[J].西藏研究,1992(2).
- [7]唐纪20[A].资治通鉴(卷204)[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8]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
- [9]吐蕃传上[A].旧唐书(卷196)[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0]唐纪48[A].资治通鉴(卷232)[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1](唐)樊绰.云南志[M].赵吕甫,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12]唐纪51[A].资治通鉴(卷235)[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3](北宋)王钦若.外臣部·交侵[A].册府元龟(卷995)[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
- [14]瑟格·苏郎甲楚.(唐)吐蕃时期的历史地名“纳川”考释[J].西藏研究,1998(4).

【责任编辑:沙彦奋】